

# 叶圣陶与赵景深的君子交

杨柏伟

作为一个曾经的、不太称职的辞书编辑，如果让我为叶圣陶和赵景深两位先生写人物词

条，我发现他俩的“概括语”竟然可以“共享”——作家、学者、教育家、编辑出版家。

叶圣陶与赵景深的年龄差了八岁。他俩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，叶是1921年创办时的发起人之一，而赵则是在两年后入会的。据赵景深回忆，他俩的文字交正是始于二十世纪初，当时赵在天津《新民报》编《文学副刊》，常在《小说月报》和《儿童世界》上看见叶写的小说和童话，非常喜欢。后来叶编《诗》月刊，赵就投去了两首诗，从此两人开始了通信。此后叶主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《文学旬刊》，赵又投去不少稿子，几乎该刊每期都有赵的稿子。多年后赵还颇为得意地说：“有时同一期登我的稿子两三篇，几乎成为我个人的专号。”

1924年，赵景深为叶圣陶的第二部创作集《火灾》写了书评，文末他感谢叶圣陶“将温柔敦厚的人格感化了我这彷徨歧路的羔羊，使我很愉快的饮着幸福之泉”。

两位神交到1925年才在上海晤面，此时叶圣陶是商务印书馆的

编辑，正主编着《文学周报》；赵景深先是做教师，到1927年进入开明书店，“接棒”叶圣陶，主编《文学周报》。1930年，赵景深离开了开明书店，成为北新书局总编辑，并任复旦大学教授；一年后，叶圣陶离开商务印书馆，成为开明书店《中学生》杂志主编。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，叶圣陶与赵景深两位每每于开会或聚餐时见面，《叶圣陶年谱长编》《王伯祥日记》中记录了不少这样的“实况”。

虽然叶赵各忙各的，鲜少串门的机会，赵景深记得他仅有的一次去叶家，居然亲眼叶圣陶和妻子、小孩和亲戚，全家动员编辑《十三经索引》。他们之间的交谊真是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不过他们的著作每有出版，还是会想着互赠求正的。

经历了抗战八年离乱，1946年2月，叶圣陶从重庆回到上海，主持开明编辑部的工作，与赵景深等老友重聚。这年8月，赵景深应《上海文化》杂志之约，写了一篇《叶圣陶论》，称赞叶是“真正的教育家、理想的编纂者”，这与叶圣陶对自己的定

位——一是编辑，二是教员，不谋而合。其实赵景深本人，又何尝不是呢？

新中国成立后，叶圣陶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副局长（后来兼任局长）。在对私营出版业进行整顿和改造的同时，取缔了一批有政治倾向性错误的书籍，第一本书就是由赵景深担任总编辑的北新书局出版的《新知识辞典》。这个决定是叶圣陶1950年3月10日在出版总署的集会上宣布的：“此书有违人民民主，故令其收回销毁”，给“出版家及读者以一种刺激，并望出版家认真编撰也”。事后，赵景深想修补后再版，叶圣陶认为不妥，他于3月14日给赵景深复信。复信言辞恳切，以理服人，叶圣陶不愧是“圣人”！北新“改编增订，精审细校”的《新编新知识辞典》于1950年10月初版后，到1953年重印了十多次，畅销不衰，这也验证了叶圣陶所言“北新之名噪，而实利亦复不菲”。

如今，叶圣陶与赵景深两位先生逝世均已三十余年。叶老的二十余卷文集以及他的传记、年谱都已出版，他的各种作品选本也不难找到。然而赵老较为完备的文集却至今未见，这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。

明清以来的画家，不少都喜欢画一些清供图，如文房配蔬果，或梅兰倚瘦石。所谓“清供”，按字面意思，即“清雅之供品”。其最早大概来自祭祀、礼佛，每到重要时日，向佛祖或是先人敬香，再供奉些鲜花蔬果之类，后逐渐被文人雅士赋予了新的寓意，成为人们节日生活中的文化习俗。尤其是新年来临，为了增添节日气氛，彰显年味，有条件的人家就会在自家的室内案头，置一些清雅悦目的装饰物以供观赏，因此又称“岁朝清供”。“岁朝”就是新年之始，年初一的大早，诸如摆放些盆景插花、时令蔬果、文房奇石、书画古玩等等，可以为厅堂书斋增添不少新年喜气和文人雅趣。所以说，岁朝清供，它追求的是一种仪式感，尤其是文人的推崇与宣传，清供就成了赏心悦目的“雅玩”，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参与和向往。

然而在过去，“有条件的人家”终究还是少数，置放“清供”虽说可丰可俭，但通常的想法总希望能尽量丰富一点，此时，文人就想出一妙招，按自己的需求，画一幅“岁朝清供图”，挂在墙上，既可补壁，又可展现丰富多彩的物品，为新年营造一派喜气。此招甚为文人所爱，渐成风气，于是，“岁朝清供图”则成为一种绘画题材，流传至今。存世最早的《岁朝图》传为北宋赵昌所作，距今也有千余年的历史了；而且画画还可以随心所欲，每年不断更换清供物品，比起线下找实物供奉自然方便不少。据说吴昌硕每年都要画一幅“岁朝清供图”，悬于自家堂室，以添新春新意。他曾于《缶庐别存》中说：“己丑除夕，闭门守岁，呵冻作画自娱。”可见他的岁朝清供图，多作于除夕，他还说“写梅取有出世姿，写菊除有傲霜骨，读书短檠，我家长物也。”除了吴昌硕，像金冬心、郑板桥、任伯年、王石、吴湖帆、张大千、傅心畲等，都有精彩的“岁朝清供图”存世。我曾经看过一组齐白石的《岁朝图》，也很有意思，齐白石是喜欢创新的画家，他的作品中喜欢加一些时下的物品，如大大的红灯笼、长长的挂鞭炮等，甚至那种“二踢脚”的大炮仗，他也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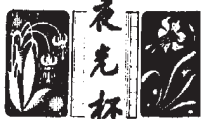
人画，可算别有新意。过去的岁朝清供图，最常见的就是梅花、水仙、天竹、月季等时令花木，再配以奇石、香果。中国文人要讨新年的口彩，最喜欢玩“谐音梗”，譬如画五个蝙蝠围着寿桃，就寓意“五福捧寿”，画梅花枝上停一只喜鹊，就寓意“喜上眉梢”，画四只红柿子，就是“事事如意”，画佛手喻示“福寿”，画胆瓶喻示“平安”，其他还如百合喻示“百年好合”、水仙喻示“神仙”，葫芦喻示“福禄”，猫蝶喻示“耄耋”，石榴喻示“多子”等等，几乎应有尽有，反正是新年的吉语祥辞、妙言佳句，多多益善。

清供的主要功能是养眼，提升心境。它一旦入画，就已经从有形实物的丰与俭、多与少升华至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了。南宋的进士林洪著有《山家清供》，其中有一诗云：深夜一炉火，浑家团坐。除夕的冬夜，一家人围炉而坐吃芋头，也是一件无比幸福满足的事了。过去大多数的书生文士，即便家中并不富裕，别无长物，但过年的仪式感依然存在，所谓现实很骨感，但想象还是很丰满。汪曾祺在《岁朝清供》一文里说，他见过一幅旧画，画一老者手捧一个瓦罐，内插梅花一枝，正要放到案上，题曰：“山家除夕无他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。”这幅旧画是谁的画谁的诗，汪曾祺没说，但与这类似的诗句，郑板桥也在他的《寒梅》图上题过，郑题的是“寒家岁末无多事，插枝梅花便过年”，意境相似，词句大同小异。另外，我见王一亭的“岁朝清供图”，也有多幅图虽不一，但皆题写了“插了梅花便过年”的诗句，可见此句应用甚广。

我想起郑逸梅好像在《艺林散叶》里也有一段掌故，说某除夕，他途中恰遇老友钱芥尘。钱问曰：“过年忙劳何？”郑答曰：一切从简，插了梅花便过年。不料钱芥尘回答说：“吾更简，不插梅花亦过年！”寥寥数字，文人之放诞洒脱，此处立现。

## 岁朝清供

管继平



## 雄甲辰

裘索

干支甲辰年的今年是一代宗师吴昌硕诞辰180周年，我索性从书架上抽出这些书册堆放在案桌上，一本中日艺术评论家松村茂树编辑的有关文人和艺术家之间的《吴昌硕谈话》的日文版书籍又吸引了我，白底黑字黑画黑白照片的封面中，一枚雄浑苍茫的朱文印“雄甲辰”尤为夺目，这是一方缶翁爱用之印，很多书画作品上钤有雄甲辰。

道光三十年甲辰出生属龙的缶翁，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，一反古人雌甲辰为雄甲辰，以泥黄石治高六十七、三十毫米正方大体量的雄甲辰自用印，右侧雄字多斜线及弧形的灵动态势，左侧的甲辰上下两字多横平竖直的静态取势，动静结合而凸显动势。方寸金石是方与圆的综合艺术、也是动和静的大千世界，线条会说话，我仿佛听到了雄甲辰的雄健浑厚之声，听到高古苍劲的金石之鸣，还有缶翁那技法之外的高迈的人文精神。将北宋《鸡跖集》中的雌甲辰自创名词雄甲辰，足见缶翁不拘泥陈规定说，老当益壮达观的人生态度，年轻时的俊脚手头不宽绰，便收藏汉砖，并将其拓印题跋。曾多次到中国古铜器馆藏丰富的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观展，每每我都不由自主地在缶翁为该馆题匾的《与古为徒》前伫立，感佩缶翁的求新求异，与古为徒又与古为新、精进至臻。缶翁专注于秦砖汉瓦，追慕古人的高趣，秦汉时期国力富强，骨子里刻理的是雄强、是风骨，缶翁也曾随吴大澂参与甲午海战，战事失利倍感痛楚，晚清最为凋敝时期，他心有物哀有呐喊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缶翁很多的作品还是倍感亲切、有启迪有共鸣，这是缶翁的人格魅力所在。

日本从元月一起便进入了甲辰龙年。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吴昌硕特展揭幕，东京国立博物馆元月2日起的特展从吴昌硕的诗、书、画、印及其与日本的交友交流等诸方面，全面呈现这位“影响日本一个世纪的中国人”的风貌。利用元旦假期，我也光顾了东博，并在石鼓文笔意篆写的12条屏的《般若心经》的展位前徘徊良久。记得2019年的己亥春节前后日本东博展出颜正卿《祭侄稿》真迹，观展结束我欣喜地看到很多为一睹忠臣颜鲁公的墨迹的“颜粉”，利用春节长假出境来到东京国立博物馆在寒风中排着蛇长的队。不仅仅东京国立博物馆，还有东京朝仓雕塑馆、东京东宫馆和关西的兵库县立美术馆先后呈现“吴昌硕的魅力与影响”、“海上画派和西泠印社”等系列纪念缶翁的活动。关东关西四馆联展，这些特展组成了一个大型特展——吴昌硕的世界。近日从缶翁后人处得知，在悉尼歌剧院举行新闻发布会，推进吴昌硕诞辰180周年在澳洲的纪念活动，新加坡、加拿大等国也随之举行类似的纪念活动。

每年3月12日，是我国法定的“植树节”，而在我的心目中，每年的初春季节，都是植树造林的好时光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项“春天里的运动”。

1978年，当我怀揣着那份“迟来的录取通知书”，刚跨进位于中山北路的华东师大校园时，第一眼就被那条平坦宽敞、绿叶成荫的通道吸引住了。望着两侧一棵接一棵粗壮的梧桐树，我心中不禁惊叹，这些梧桐树恰若庇佑莘莘学子的屏障，蕴含着教书育人的魂魄。

三十年后，我们这一届中文系的同学集体返校，参加纪念活动。通道两侧的梧桐树

## 照我思索

陆其国

湘西有座名传遐迩的凤凰古城，距凤凰古城不到一公里有座听涛山；从山中拾级而上，不一会便可看到一座质朴的墓碑——这便是沈从文的骨灰安葬处，也是他安息和长眠的地方。墓石正面镌刻有沈从文的十六字箴言：“照我思索，能理解‘我’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‘我’。”墓石背面是沈从文妹妹张充和写的挽联：“不折不从，亦慈亦让；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。”是的，沈从文是作家而非思想家，他也没有留下纯思想类的著作。但这并不代表他涉“思（想）”不深。一个行事愿他人“照我思索”，并由理解“我”进而认识“人”的作家，应该没有谁会怀疑他的思想智慧。就以年轻

## 重逢

廖书兰

一次因缘际会下，重遇两位五十年失联的中学同学，相逢的刹那，有数秒钟的迟疑；究竟是那岁月无情给彼此留下的风霜，脸庞似曾相识，又似不曾相识。虽然如此，彼此样貌可

变，但声音与神态却改变不了。相认之后，当年的种种回忆，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五十年的光阴，经历了结婚生子，事业的成功与失败，饱尝爱恨交织，得到与失去。于是我们相约一起庆祝五十年后的重逢，分享这五十年的

人生经历。世事沧桑，当年想不开的、放不下的爱恨情仇，到如今发现所有的在意，其实都是在当下而已。生命的丰盛之处在于经历过程，以及仅与自己在平行或交叉路上所遇到的人和事，如此而已。

越发苍劲茂盛，让我们显得依然年轻，意气风发。那天，我们虽然没来得及去往闵行新校区参观，但我们相信，因为有了这种勃勃焕发的精神铺垫和传承，母校华师大一定会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新的教育人才。

我也格外喜欢银杏树。我的家乡在沪郊古镇罗店，当年，我还在下乡务农时，生产队分给我家的“自留地”，就在镇北侧的两棵百年银杏树旁。当年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自不必多说，没想到的是，随着古镇的变迁，这里的农田全都被布局为新的房舍和道路，唯有这两棵古树被毫发无

人表达浪漫爱情来说，沈从文当年写给张兆和的情书，也绝非世俗的缱绻旖旎，蕤蕤澹澹，而是别含深意地写道：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

诚然，一个人的思想不会凭空落地。早先青年沈从文因阅读和写作专长，得以进入报馆任校对。他在报馆认识了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同事。就是这个青年同事告诉他，写白话文最要紧的是“有思想”，无思想不成文章。在这位青年同事的推荐下，沈从文开始关注《新潮》杂志及其他进步书籍。后来沈从文在写于1931年8月的《一个转机》

一文中提到，读过这些新书刊后，让他想到“知识同权力相比，我愿意得到智慧，放下权力”。以及人活着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，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，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。”沈从文曾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写过一部传记《记胡也频》，他在文末更是借生死思索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：“一个人他生来若就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，他认真地生活过，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。”又说：“我觉得，这个人假若是死了，他的精神雄强处，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，还更像一个活人。”这也许也是我们今天解读沈从文，由理解“我”而认识“人”，以及“从文让人”背后寓意的一个文化密码。

如今，我住在宝山城区，城里城外的马路两侧都种上了各种行道树，梧桐、杨柳、香樟、玉兰、榆树、樱花……而其中的樱花，在顾村公园里更是蔚然壮观，缤纷灿烂，公园每年举办的樱花节期间，游客如云，无不流连忘返。

由于职业的特性，多年来，我不知多少次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植树绿化活动。如今，我已退休，不再参与那些大型的“植树节”活动，但我还是喜欢这类事项，每当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的季节里，我便常常会回到故乡，或者去到我那些还住在乡下的朋友、学生家里度假，和他

## 一起种树去

赵荣发

从那个路口往东拐弯，就可以通到寺庙，再走进古镇街巷。”客人们照此而行，果然消去了迷惘，有时刚拐弯，就听到寺庙里传来的撞钟声，更觉赏心悦目，气定神闲。



深情 (国画) 吴曙

## 十日谈

春天宜动

责编：沈琦华

我从小身体就弱。因此就有个老中医建议我要多走路。